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

汲取红色力量 筑牢信仰根基

小岗村：18枚“红手印”摁响“惊雷”

干！1978年冬夜，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

“我们分到田，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张“生死契约”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文物，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小岗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18枚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18位庄稼汉，如今只剩下10位，多数已年逾古稀。

坐在“金昌食府”门前的沙发上，说起惊心动魄的往事，年近80岁的严金昌双眼闪烁着光芒。金昌食府是老严开的农家乐，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多年前，他把当年冒着风险分得的30多亩地都流转出去，和孩子们再次“创业”：办农家乐、开超市、发展乡村旅游……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不断传承发扬

下去，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攻坚克难、闯关突破。小岗村先后在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试点、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等，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实现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福建盼盼集团、北京思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安徽农垦集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合作范围的扩大，小岗村集体经济来源越来越广，收入也“芝麻开花节节高”。2016年至2020年，小岗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169元跃升至276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680万元增长至1160万元。

“父辈们的大包干解放了生产力，掀起了改革浪潮，我们呢？”——“小岗青年创业交流”微信群里常常有这样的讨论。

这个微信群里有小岗18位“新带头人”——小岗青年创业之星，还有远在上海、北京等地工作有想法有思路的年轻人。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严余山是群友之一，他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儿子。在外打拼多年后，2014年他辞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家乡发展。在他家客厅，摆有一块小白板，一些关乎小岗发展的“金点子”他都提笔记下。

“纪念父辈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改革。”严余山告诉记者，当年的那一记“惊雷”如今依旧回响。

文/新华社记者 陈诺

袁庚：改革精神照后人

口井，经济发展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原总经理梁宪回忆。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勇于担当的作为，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开工。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们干劲大增，工程进度迅速推进。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做法，渐渐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普遍采用的重要激励机制。

正是在袁庚的大力推动下，蛇口在短短数年间启动了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活动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亮相天安门广场。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曾表示，1983年他南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当听到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之后，有了创业的激情。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回忆，如果没有“时间就是

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当年的深圳断然不会产生招行、平安、华为、万科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

在梁宪看来，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

蛇口工业区的探索起步，揭开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序幕。

40多年来，从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20年的2.77万亿元，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

在盘点了全球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用“若干成功典范中最突出的一个”来形容深圳。

晚年的袁庚，常常请司机带着他在蛇口港区、赤湾港区和妈湾港区沿路走下去，带着欣喜和满足。

2016年1月31日，袁庚因病逝世，享年99岁。2018年，袁庚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孙飞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新华社发）

时值夏收，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高标准农田里麦穗金黄，笔直宽敞的马路卡上车、农机川流不息，林立的徽派小楼中乡村振兴银行刚刚挂牌，客户络绎不绝。

小岗，这个被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村庄，迎来又一年的丰收。如今的场景让人难以想象：40多年前，这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山乡巨变，要从当年18位庄稼汉的“红手印”说起。

1978年，安徽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农田布满裂缝，土地撂荒，农民外出乞讨者不计其数。在那个“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粮食。

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分田单



这是袁庚像。

（新华社发）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蛇口微波山下立着的这句著名口号，让人想起改革先锋袁庚。

袁庚，1917年4月23日出生，广东宝安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莞两岸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军事教员、联络处主任、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团长。1949年后，曾任中国驻雅加达领事。

1978年，袁庚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随后在深圳创办蛇口工业区，并进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区的雏形”。

“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僻壤，淡水只有两

谢高华：顺民意开放义乌市场



这是谢高华。（新华社发）

正在浙江巡演的婺剧现代戏《义乌高华》受到观众热捧。剧中主人公的原型谢高华曾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义乌县委书记，他坚持群众需求就是第一导向，冒着丢官的风险，打破条条框框，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绿灯”，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他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谢高华，1931年出生，浙江衢州人。1982年5月至1984年12月期间任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

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

商品市场还没有明确论，仍把这些路边摊市场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打击。

1982年6月的一天，在县城摆摊经常被有关部门“围堵”的农户冯爱倩，在县委大院外拦住了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许老百姓摆地摊。当时，谢高华到义乌才一个多月，冯爱倩的话让他深受触动。

谢高华开始对义乌群众摆地摊等经商情况进行调研，又带队到温州考察，越调研越觉得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原则，政府需要顺应民意给地摊市场松绑。

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为市场松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不少干部怕担责任，顾虑重重。对此，谢高华在一次县机关大会上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82年9月5日，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商品市场。一时间，周边县市被“围堵”的摆摊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义乌。

在此基础上，义乌县委、县政府又发出“四个允许”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进城，允许长途贩运，允许许多渠道竞争，进一步为城乡经济松绑。

1984年，谢高华结合义乌实际首创“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带领全县干部勇敢坚持、积极作为、精心培育，从而催生了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谢高华曾坦言：“当时，只想对老百姓有益就好，要打破条条框框，我们

干部自己的得失又有什么关系？”

“他开创的良好营商环境，是义乌成功的一大秘诀。”谢高华曾经的同事、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守春说，谢高华眼里只有工作，工作特点就是吃透上头精神实质，潜心研究当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干出地方特色。“他用白天80%以上的时间跑基层，用每晚近5个小时的时间在办公室吸收消化各种信息，笔记本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备注。”

“谢高华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作为开创义乌市场的功臣，他在义乌没有任何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也未持有任何义乌企业的股票。”杨守春回忆说。

《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一书的作者之一何建农说，“要致富，到义乌”成了当时各地供销人员的口头禅。谢高华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义乌历届班子接力探索、赓续奋斗，成就了今天的义乌市场。

1995年，谢高华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他，从1995年起，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众多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举着横幅、手摇拨浪鼓欢迎谢书记“回家”，以此表达感激之情。

“飞鸡毛引银练无愧先锋，生于斯长于斯情系金衢”。2019年10月23日，谢高华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灵堂现场，这副挽联概括了谢高华的一生。

文/新华社记者 谢云挺

许海峰：一枪定乾坤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在获得男子自选手枪项目冠军后领奖。（新华社发）

举杯，瞄准，击发……

在1984年夏天的洛杉矶，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奥运赛场上射落金牌，至此，中国体育史竖起了一座重要里程碑。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迎来了中国人登上冠军领奖台的时刻。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颁奖时对许海峰说：“今天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

岁月如梭，这段珍贵的历史，被一代代体育人反复传颂。

如今已经退休的许海峰，对近40年前的那次奥运会依然记忆犹新。他当时以为，奥运冠军与其他世界比赛的冠军区别并不大。那是他第三次出国比赛，前两次的亚洲锦标赛和奥运会测



这是胡福明。新华社记者 方爱玲摄

说起改革开放历程，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胡福明。他写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了一声春雷，随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

走进胡福明在南京的住所，曾经的哲学青年，如今已是满头花白的老人。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老人的眼神明亮了许多，仿佛昨天刚刚发生。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和同事们一起，以饮酒吃蟹的方式来庆祝，并积极投身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然而，1977年2月7日，有报纸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这让胡福明非常吃惊。他敏锐地意识到，按照“两个凡是”的标准，历史将重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胡福明决定写篇文章，谈一下自己的看法。1977年的三四月份，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犹豫了一个多月，他暗下决心开始动笔。

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照顾妻子期间，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带到医院，在病房走廊里蹲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困了，就把三把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5天后，妻子出院，文章提纲也大致写成。9月初，胡福明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在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章发表后，积极的反响和来自各方的指责几乎同时产生，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有人指责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很坏很坏的’‘是砍旗的’。”对于这些斥责声，胡福明淡然面对。他坚信，实践会证明一切。

终于，因为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发现错误思想不去批判，我就对不起党，不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回忆起当年写作文章的初衷，胡福明仍然心潮澎湃。

如今，胡福明依旧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国家大事，爱人张丽华每天为他读报、读书。在全国上下喜迎建党100周年之际，两位老人每天坚持读党史。

离开胡福明家时，午后阳光洒满庭院，院子里的花儿开得正艳。老人起身已很吃力，但依旧坚持与每一位记者握手告别。他希望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希望改革开放的脚步越走越坚实。

文/本报记者 薛海燕

胡福明：思想解放发先声